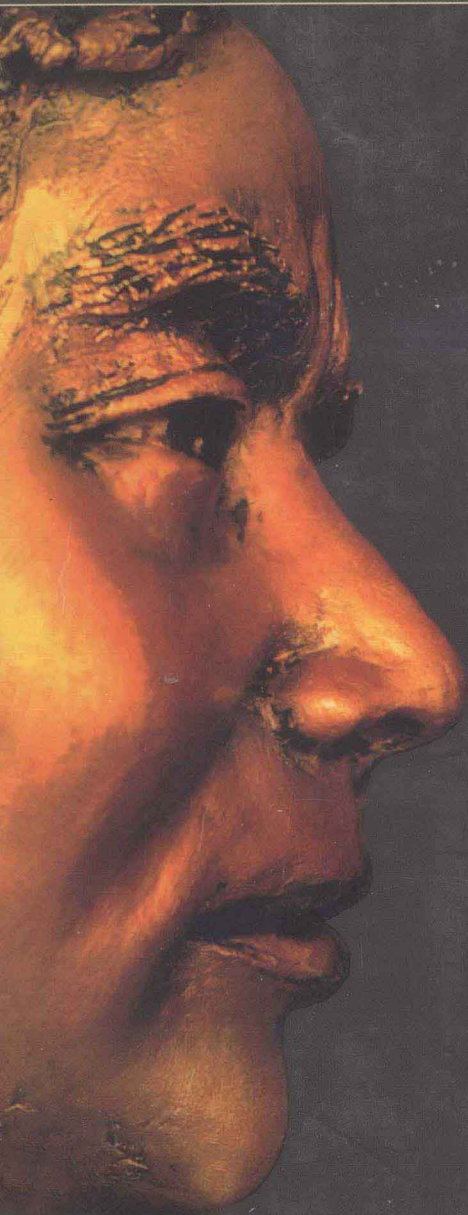


亚洲讲稿之十



零五热点

刘亚洲

2005·6·武汉

亚洲讲稿之十



零五热点

刘亚洲

2005·6·武汉

~~刘亚~~ 信与通社!

2002年5月17日 刘亚讲稿

① 中国加入WTO

~~一 中国加入WTO. 经济影响. 国际收支
平衡. 贸易收支~~

① 中国加入WTO的经济影响

(△ 对新兴市场的影响 /
贸易收支 / 国际收支)

△ 第二次: “通向一个新世界……”

一 中国加入WTO

△ 一 贸易收支, 国际收支比例 5分球

△ 贸易收支: “如母如子……牛”

△ 国际收支, 贸易收支

△ 汇率

△ 一 贸易收支
……

刘亚洲讲稿提纲手迹

编者按

我编辑部刊印了《亚洲思想库》，反响巨大。现又将刘亚洲将军近年来的讲话、讲座收集整理，冠以《亚洲讲稿》之名，内部刊行。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特此说明。

《国家战略》编辑部

2005年9月

前 言

2005年，大事不断。年中，刘亚洲到位于武汉的空军某大学考核班子，应全校师生的强烈要求，讲了一课。题目是作者本人起的。

零五热点

——在空军××大学的讲话

刘亚洲

2005·6·1·武汉

目 录

1	零五热点
第一章	
10	日本问题
第二章	
46	台湾问题
第三章	
70	创新问题

很高兴在这里和空军××大学的同志们欢聚一堂。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今天我特意戴了一个空军××大学的校徽，表示我也是大学人。这两天在大学工作期间，思想上、感情上、视觉上都受到了很大冲击。大学班子是一个好班子。你们的院长、政委，是好的班长、副班长。大学是一个好大学，也是一支好部队，为今后腾飞奠定了基础。

大学地处武汉。今天你们大学的形势很像一百年前的武汉。那时候，武汉三镇乃至湖北大地，涌动着一股潜流。

这股潜流当时鲜有人注意到。制造这股潜流的人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在武汉成功？与张之洞有很大关系。满清灭亡后，遗老遗少中稍有点头脑的人，不骂孙中山，却骂张之洞，认为张之洞是亡清的祸首。这可真有意思了。你们看，孙中山组织了那么多次起义，无论是广州起义，镇南关起义，惠州起义，都失败了，可革命偏偏在他没想到的时间，在没想到的地点发生了，并取得了成功。张之洞和李鸿章一样，是清廷中积极推行“洋务运动”的人。他率先在武汉办钢厂，造枪造炮，出报纸，办学堂，组建新军。尤其重要的是，他把西方一些先进的思想引进了武昌。他的本意当然是维护满清的统治，但没想到先进的思潮一旦涌进，是任何旧势力都无法阻挡的。革命就这样无可挽回地发生了。可悲的是张之洞当时也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甚至还讲过这样一

句话：“湖广地窄，不足以周旋。”我感到，在你们大学，现在也涌动着—股潜流，—股向上的、科学的、求真务实的潜流。这股潜流终会爆发出来，成为洪波。郭沫若在武汉写过《洪波曲》。谁说这书名不是你们大学的写照？

今天，我应校长、政委及广大教职员工的邀请，为大学讲—课。我先声明，绝不是做报告。作为空军副政委，—讲做报告，听的人就要有级别，比如，只有团以上干部才能听。这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我还是把领导的身份放下，当成大家的一员。今天特意戴了校徽，说明我是教员。毛主席说他最想当的还是老师嘛！把职务抛开我就能放开讲。

在军队中，甚至不止在军队中，在整个中国，我以思想开放著称。但如果你们想从我这里听到—些不同的声音，那就会失望了。我要讲的肯定是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声音，也就是说，肯定是真

理。当然，同样是真理，却存在一个如何表现的问题。我们今天表达的东西全是正确的，但怎样表达更好？怎样表达更让人易于接受？首先肯定是简单，或者说简洁明快。我们机关大量的材料是冗长的。冗长代表无效。无效代表有害。有些领导同志竟认为材料越长越能代表水平和能力。甚至把能不能搞长材料当作衡量干部能力的标志。最好的材料，有时候可能就一句话。美国兰德公司对朝鲜战争的预测只有七个字：“中国将出兵朝鲜。”这一句话要价五百万美金，美国政府不买。因为它不相信中国会出兵。五百万美金，当时连一架战斗机都买不了。美国政府为了节省一架战斗机的钱，结果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说，我们应当像战争年代那般简洁。战争不容许繁锁。我们的同志在写材料时如果能听见隐隐的枪炮声，就不会连篇废话。上甘岭战

役时，战况空前惨烈。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要通了困守在上甘岭坑道里的部队，刚说了一句：“转告坑道里的同志们，军党委很惦念着前面的同志……”电话员竟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军长的话：“首长别罗嗦了！拣要紧的说。先下命令吧！”“拣要紧的说”，这话多好啊。太深刻了。我们平时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秦基伟同志后来说：“战士们做得对啊。那时牺牲了很多通信员，也很难保障电话长时间畅通，只能抢一句算一句。”

我们怎么非要长篇大论呢？这是我深恶痛绝的。我是不念稿子的。任何时候做报告我都不写出稿子。稿子只会束缚我。真理一定是活泼的，并且是很容易被记住的。好的语言，好的道理，绝对是过目不忘的。只要能忘记的，只要需要强记的，只要需要天天讲，月月讲的，可能就不是真理。我们见到的许多传播真理的文字，却常常刻板得令人

生厌。消灭真理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压制，不是禁止，不是反对，而是使真理变得令人生厌。没有人愿意阅读。只要人们讨厌它，真理就失去了它的全部魅力，更谈不上力量了。你每天给大家灌输那种冗长的、乏味的长篇大论，大家没有不讨厌的。让真理变得活泼，让大家记住，是非常容易的。同时，让真理变得让大家讨厌，也是非常容易的。饭，只有在饥饿的时候才是香的。如果母亲天天给儿子不停地喂饭，他又不饥饿，不倒胃口才怪！有一个丈夫和老婆吵架，他天天训斥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老婆说，我就是真有这些缺点，就靠你用这种方式，天天说我，我明知有错，也不改。

我们有些机关材料太多，会议太多，要改正。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我对此已身体力行十余年了，仍然做得不够。有些人对我的做法不理解。我说我一般

不开会，或者是少开会。反对的人说，你不开会，你整天干什么？他们认为当官就是要开会。去年上国防科技大学时，我说：我军很多单位都做着两件事：一是开会，二是准备开会。难道现状不如此吗？我每到一个单位，不论是北空、成空还是空军，首先撤掉的就是我办公室里的沙发。我不让你坐沙发。本来我连仅剩的椅子也想撤掉。人来了，就站着说，说完了就走。但想想很不礼貌，还是算了。我在成空时，曾在脑海里冒出了一个想法：把成空党委会议室里的沙发换成木头做的硬椅子。沙发很舒服，一坐上去就昏昏欲睡，开会时间再长也不觉得。而硬椅子就不一样了，硌得你疼，逼你坐不长久。这样我们就可以节省时间了。但后来我并没那样做。

我们党内的文牍之风，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每一个中高级干部，都应该身体力行。

我一直站在反对文牍之风的最前沿。我认为我是在同一种强大的势力抗争。我个人的声音非常微弱，但它就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声音。和传统势力抗争，如同在抗洪抢险时与狂虐的大自然抗争一样：人的力量显得那么渺小，同时，人的精神又显得那么强大。

言归正传。今天我讲课的题目是：“零五热点”，什么意思？即二〇〇五年的热点问题。其实还是想借着热点问题谈谈战略。中国是个战略缺乏的国家，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和历史造成的。弱势民族需要谋略。强势民族需要战略。人弱了，为了生存，就得想点子。国弱了，为了生存，也得想办法。我一直对诸葛亮有点不以为然。我说他的最强项是谋略，有些同志不同意，说：“‘隆中对’不是战略吗？”我回答：“隆中对”差一点就是战略了，但仍只能算在谋略范畴内。“隆中对”决定了三分天下，但一

一旦实现了目标，就失去了发展的后劲，既不能灭吴，又无法破曹，只能自保，结果最不能自保。相比较诸葛亮，曹操和司马懿倒是充满了战略目光。曹操有征战天下和用人的战略。司马懿有篡夺政权的战略。这几条正是诸葛亮所缺乏的。

一、日本问题

日本问题成了今年的焦点。我对日本问题一直非常关注。我在《大国策》和《大战略观》中都谈及日本问题，还专门写过《日本论》。虽不及戴季陶的《日本论》涉及面那么广，也有独到见地。不过我先要做一个声明，最近在网上流传的关于我对日本问题的一篇讲话是假的。这篇讲话题目为《欲让人尊，必先自尊》。网上有我不少文章，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即使是真的，也不

是我上的网。我遵守规定，从不上网。很多网友把我的文章贴上去是“顶”。但冒充我的名义上的假文章就另当别论了。有这样一件事：前几天的《北京青年周刊》突然刊登了一篇我的文章，题目十分唬人——《刘亚洲将军说：思想是最性感的器官》。这句话我的确说过，但必须上下文一起看，单独摘出来就有问题了。文章的内容也是同样，把我众多著作中的一些话挑出来，拼凑成一篇文章。错倒是没有，但读后很刺激人。有些语言的确很精彩，但精彩的言论乍一听都像是反动言论。文章还配有我的照片。我马上让空政宣传部的同志到北京青年报社去查，原来是他们接到了一篇以我的名义投稿的文章，还附着照片，自然求之不得，立即隆重推出。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竟然是别人冒用我的名义写的。此人是什么目的，我也搞不清楚。也许是替我出名？我不需要出名。也许

是栽赃？我无赃可栽。也许是臭我？偏偏我香得很。后来在我的请求下，报社专门登了郑重声明和道歉。

网络对人类有巨大的贡献。相比较现实世界，它成了另一种空间，一种虚拟的空间。它像另一个世界。这样一个虚拟的世界最适合什么人呢？我认为最适合中国人。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压抑太久了，极需要通过另一个空间释放自己。同志们想想，我们从生下来，到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讲过几句真话？小时候我们常讲真话，偶尔讲几句假话；长大了我们常讲假话，偶尔讲几句真话；再大些，那就什么话都不讲了，完全沉默了。这样过一辈子是比较可悲的。现在好了，网络出现了。我们中国人可以在网络上大声讲话了。过去不敢说的话，都可以通过网络一吐为快。然而，需要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就是用假名。我们平时用真名的时候只能说假话嘛，到

了网上我们就可以用假名说真话了。可我们真话有多真？真话难道就是脏话吗？如果不是，为什么我们网络上那么脏呢？脏得像……像进了北京胡同里的公共厕所。中国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残酷的刑法。中国人也发明了世界上最残酷的骂人的话。到网络上去看看中国人的骂人话，准能搞个吉尼斯大全。中国人的智慧都表现在骂人上了。

最近，日本问题凸现。这个问题严峻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摆在中国政府面前。凡事要追根溯源。日本问题的根子在哪里？根子在美国。要了解日本，首先要了解美国。我在一部作品中说过这么一句话：“美国人已到门前。”在我们全体的目光都注视着东南沿海那个小岛的时候，美国人却在我们的西边频频得手。阿富汗得手了，伊拉克得手了，吉尔吉斯斯坦也得手了。最近乌兹别克斯坦又闹起来了，都在搞“颜色革命”。

西边它搅翻了天，可东边却挺“配合”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和我们的态度是惊人的一致——维持台海现状。我曾经对一个中央领导人讲，维持台海的现状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维持台海现状是美国人的想法。我们对台湾不是要维持它的现状。台湾现状是什么呢？是台独分子执政。这种现状应该维持吗？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去搞垮它。

不错，美国人确实主宰着世界，但我们要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比如，美国人讲：反恐怖是他们的阶段性主要任务，我们理论家也讲，说反恐怖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某大学的一个教授就讲过这话。反恐怖不仅不是中国的主要任务，连次要任务都不是。美国人讲什么就是什么呀？美国的帝国心态越来越明显，美国的帝国形态也越来越明显。美国总统布什最近讲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我们就是要把美国的价值观和文明

推广到世界各国去。胡锦涛总书记把这句话抄在他的外事笔记本的扉页上。胡总书记为什么这样做？居安思危嘛。胡总书记对美国的野心是有警觉的。这不禁令我想起当年勾践每天晚上睡觉前和早晨醒来后，都让一个仆人在外面提醒他：“勾践你忘了会稽之耻了吗？”勾践答：“不敢忘！”美国是中国走向世界性大国的终极障碍。中国在新世纪如果要崛起的话，必须迈过美国人给我们设的坎儿。我们有可能迈得过去，也有可能迈不过去。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的成功有它的客观因素，也一定有它的主观因素。地理因素是客观的，但新教肯定是主观的。基督文明是客观的，但《独立宣言》肯定是主观的。这一帮飘洋过海的欧洲人骨子里有一种不畏艰难，敢做敢闯，我行我素的强悍之风。小布什身上就有这种“牛仔”的风格。2000年竞

选中，一个记者问小布什：“你知道车臣总统是谁？”小布什迅速地然而却是坚决地回答：“不知道！你知道吗？不知道又怎么了？”文明传统过于悠久的国家，常常由于历史包袱太重而放不开手脚。文明传统短暂的民族，反而无所顾忌。中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浩繁典籍的民族，却成为了世界上最欠发达的民族。美国，一个仅有二百余年历史，几乎没有什么典籍的国家，却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说日本，不得不先谈美国。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谈什么也绕不开美国。尤其日本完全是在美国的驱使下行事的，就更不能不说了。这里牵扯到美国的亚洲战略。美国的亚洲战略有两条：第一，让亚洲人打亚洲人；第二，美国在亚洲的头号敌人不是中国，而是日本。这话我要慢慢给你们讲。好多人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头号敌人是中国，这不对。美国

在亚洲的头号敌人还是日本。马上就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了。也是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六十周年。美国对日本的认识就源于这次世界大战。日本的门户是被美国人的炮舰打开的。那时候美国人根本瞧不起日本这个蕞尔小国。然而才半个多世纪，日本就连续打败了两个世界强国，一是清国，一是俄国，自己也成了世界强国。二次大战中又痛击美国。美国人最终赢了，但赢得极为艰苦。说是“惨胜”，毫不为过。日本军队的强悍，科学技术的先进，教育体系的完备，都给美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给美国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日本人的精神。从单兵来讲，日本单兵的素质超过美国军队、俄罗斯军队、德国军队。日本单兵素质世界第一。我爸爸曾跟我讲，八路军与日本鬼子刚交上手的时候，并不知道日本兵那么顽强。那些老八路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精华，与日本兵拼刺

刀，往往要好几个人对付一个。很难抓到日本兵的俘虏。有这么一个故事大家都可能听说过，上世纪七十年代，从菲律宾丛林中走出来一个衣衫褴褛的日本兵。他是在二次大战末期美军登陆菲律宾的时候和几个战友潜入丛林进行游击战的。几十年过去了，战友均已死亡，只有他一个人在坚守。风餐露宿。与野兽无异。菲律宾人知道他的存在，一再进行广播，散发传单，告诉他战争早已结束，希望他回归人间。但他根本不听。在这个世界上他只听一个人的，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小队长。他就被训练成这样。所有的日本兵都被训练成这样。菲律宾政府甚至把他的亲人召来喊话，他也不听，认为是敌人的攻心战。直到最后找到他的小队长，到丛林中向他发出放下武器的命令，他才出来。三十年过去，沧海桑田，他几乎都不会说话了。

这个日本兵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是

有些可怕的。更可怕是几乎每个日本人都具有这种精神。一个民族在战争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在和平时期也能表现出来。举日本经济为例。战后美国牢牢地控制着日本的经济走向。很多东西日本人不是搞不出来，而是美国人不允许它搞。飞机不能造。卫星不能造。它只能造汽车，造收音机，造手表。即便如此，日本偏把这些小玩意造到极致。它不曾用三八大盖枪征服世界，却用电视机和汽车征服了世界。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被打成一片废墟，六十年代它和中国的经济不让仲伯，但我们从六十年代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日本经济起飞，一下子跑到前面去了。弄得美国人非常紧张，1997年搞了个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是打日本，才制止了日本冲刺的势头。

美国人不怎么怕中国，但非常怕日本。中国人历史太长，长得使这个民族行走起来老态龙钟。中国人没什么凝聚

力。用孙中山的话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日本人凝聚力特别强。日本投降后，一个美国记者曾在日本采访，接触到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竟还那么士气昂扬。他太吃惊了。

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日本的。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美国对日本的警惕比对中国的警惕大得多。美国不仅在按自己的意愿设计日本，还在用自己的意愿改造日本。它做得非常成功。在美国的设计下，日本不能拥有军队。日本的宪法是永远放弃战争。日本现在要想打仗，就触犯了法律。日本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军事上的二腩子。它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只能为美国的利益而战。这不是二腩子是什么？石原慎太郎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说美国人割掉了日本的睾丸。睾丸是男人的“根儿”啊。美国人在动日本人的“根儿”呢。

大家一定会问：日本人的“根儿”

究竟是什么？别急，下边我还要讲。今天，日本很想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其用心就是想让世界承认它的大国地位。印度想挤进安理会，也是同样目的。但，是谁阻止日本成为世界大国呢？是中国吗？是韩国吗？是俄罗斯吗？都不是。恰恰是美国。说实在的，美国能让德国当世界大国，却不一定会让日本当世界大国。除了德国认罪态度好，已经获得世界原谅的因素外，还有种族因素。美国当年能对日本丢原子弹，就不会向德国丢。欧洲是美国天然的根基。这里面有一个种族问题。日本当年崛起时，所倡导的口号就是把亚洲人从白种人手中解放出来。我看这不一定是惺惺作态。日本人毛病多多，但很少说假话。举个例子，日本人拍了那么多与俄国人打仗的电影，却极少拍与清国打仗的电影，至少我一部也没看过。日俄战争的电影多如牛毛。日本人觉得与中国人打仗没

什么激情。同种同族。与白种人打才有激情。算一家之言吧。

这个曾经为黄种人的出头而与白种人战斗了那么久的民族却被白种人生生地骑在脖子上压迫了那么久。六十年，一个甲子。日本人难道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吗？毛主席当年说过，日本没有真正的战略家。老人家说得真对。日本其实在亚洲的地位最低。再穷的国家也有主权，日本没有。也就是说它没有脸面。美国在亚洲不少国家驻有军队，在日本生活得最惬意。连菲律宾都敢要求美国撤军，它也就乖乖撤了。日本敢叫美国撤军吗？它绝对不敢。我有时候真希望日本人邀请我去给他们讲课，我会适当地“挑拨”一下美国关系。他们看不到，我看到了，替他们说出来。

奇怪的是，美国这样压迫日本，日本一声不吭。日本的门户就是被美国打开的，那是日本的“鸦片战争”，也算国

耻吧。原子弹自从制造出来后只用于实战一次，也是在日本。三十万人转瞬间灰飞烟灭，饶是血海深仇。可日本人一点也不恨美国人。无论美国如何欺负它，它就是乖乖地在美国的胯下生活着。它只跟一个国家过不去——中国。我们老说日本不认错，这话不全对。日本只是不向中国认错。你看它向不向美国人认错？它甚至向韩国人认错了，就是不向中国人认错。我们批评日本篡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但它为什么不篡改偷袭珍珠港的历史？明朝以降，日本打过中国多少次？中国一次也没有打过日本。二战后既不去日本驻军，也不要日本赔款，可日本偏偏就是和中国作对。这是为什么？这必须从日本的民族性说起。

世界上的民族林林总总，却大致只有三种文化，一种是耻感文化，一种是乐感文化，一种是罪感文化。西方是罪感文化。基督教的教义认为，世界上有

一块最黑暗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是在黑夜，不是在山洞，不是在深渊，这个最黑暗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人心里。人生来是有罪的。人必须承认自己有罪，才能克制自己犯罪的欲望。做人如此。做事亦如此。选举一个政府时，制定一项政策时，都从恶和罪这一概念出发。他连自己都不相信，能相信一个政府和领袖？这才产生了健全的法律和法制。为了拯救自己的罪恶，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拯救大兵瑞恩》。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不理解，牺牲这么多人，去拯救一个年轻士兵，值吗？只要你一问道出这个“值”字，就证明你是乐感文化圈里的人。一个家庭，三个儿子都战死了，还剩一个，美国政府说什么也要让这个硕果仅存的人活下去。它承受不了让全部孩子都阵亡这种负罪感带来的重压。不要说牺牲七、八个人，就是牺牲一个营，一个团去救这一个人，

在他们眼中也是值得的。

中国是乐感文化。乐感文化最根本的标志是，人是善良的。人必须尊重自己。生命第一。生存第一。肉体的存在高于精神的存在。肉体的存在已化作一种本能。只有肉体生命，没有精神生命。乐感文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信仰。一切都要进行成本核算，也就是刚才说的“值不值”的问题。没有是非观，只有成败观。马克思有一句形容中国人的惟妙惟肖的语言，他说中国人像“一袋马铃薯”，真是太传神了。用一条口袋才能把它们聚在一起。口袋一松开，就轱辘轱辘乱滚开了。有点刻毒，不是吗？可刻毒得那么痛快！刻毒得那么有才气！哈哈。

日本是耻感文化。它的耻感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中国来的。看看中国先秦的典籍，就知道什么是耻感文化。耻感文化有几个特点：第一，精神第一。

做一件事，不管这件事情能否做成，一定要在做它时体现出一种精神，一种价值。精神和价值高于一切。讲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古代中国的，大家就会明白什么是耻感文化了。齐国有两个勇士，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二人相互仰慕。有一天两人见面了，城东的勇士提议，咱们今天要喝酒。城西的勇士说：好。但喝酒没有肉怎么办呀？城东勇士说：那好办，割自己腿上的肉吃。城西勇士说：这个建议太好了！我也是这个意见。结果两人一边割自己腿上的肉一边喝酒，最后两人都死掉了。这个故事记载在《吕氏春秋》里。类似的故事，在先秦比比皆是。还有一个故事叫“梦辱自杀”，说的是古代一个人在睡觉时梦见别人羞辱了自己，起床以后就自杀了。我们祖先的这些壮烈的举动今天后人能理解吗？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有个重要角色叫田光，正是他向燕太子丹推荐了荆轲。太

子丹离开田光时嘱咐，刺秦王是一件大事，你一定要保密啊。换成现代人，我们会说：“太子你放心，这话到我这儿就进坟墓了，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田光不这么看，他认为太子丹这种嘱咐，就是对他不放心，不相信。为了让你相信，也为了不承受这种侮辱，田光拔剑自杀了。《吕氏春秋》成书时，儒家文化并未在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但已经有了转向趋势。譬如吕不韦在记载了齐国二勇士的故事后就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说：如果说这是勇敢的话，那么这种勇敢不要也罢。

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与今天日本人的思想与行为很相像。正如现在看唐代建筑要到日本去一样，若要领略中国古人的风范，就要从今天日本人身上去找。日本人做一件事的时候，固然追求要把事情做成，但更追求通过做这件事体现一种精神，体现一种价值。凡

是和日本鬼子打过仗的人无不感到，同日本人打仗真难啊。林彪说：平型关一仗打下来，干掉千把多鬼子，全是尸体，没抓住一个俘虏。日本人打仗，总是想方设法把士兵前推到短兵相接的距离，也就是拼刺刀的距离。日俄战争攻打旅顺的二〇三高地、东鸡冠山，据军事专家讲最多阵亡五、六千人就可以拿下来，可日本硬是死了几万人。日本鬼子在上刺刀的同时还有一个口令：“退子弹”。我常想鬼子怎么这么笨。枪膛里留颗子弹不挺好嘛。拼不过时，“砰”地给你一枪。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乐感文化在作祟。日本人认定拼刺刀就不能用子弹。如果这样的士兵去搞企业，你会担心他造假吗？还有一个现象人们不大理解：日本鬼子打仗时很少救助伤兵，几乎没有成功地进行过战争救护。从耻感文化角度看，这就好理解了。他不屑去做这种事。这和日本女人在产房里从不喊叫

是一样的。

给世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日本人自杀。自杀有很多方式，有些方式既方便，又无痛苦。网上就有助人自杀的网站，浏览者众多。但日本人自杀，一定要采取切腹的方式。切腹最痛苦，时间最长，头脑最清醒，因而也最残忍。但日本人就是要追求这种残忍。死，在这时已经不完全是一种目的了，而是一种过程，一种体现自身价值和精神的过程，充满了仪式般的美感。切腹者就是要让自己头脑极其清醒地死去，要清晰地或者说从第三者的角度审视自己的死亡。一个人有这种心态倒不可怕，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种心态那就可怕了。一两个人的切腹所造成的震撼，远比满满一广场的人静坐还要来得厉害。

耻感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只承认胜利者。日本为什么害怕美国，因为美国对它而言是胜利者。日本为什么看不

起中国，因为中国从未击败过日本。有一个日本人讲过一句话：我们是一头狼，挨了十几拳，死于两颗子弹。这话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这只狼啊，被中国人打了十几拳，最后两颗子弹死在美国人手上。两颗子弹就是指投在长崎和广岛的原子弹。他不承认你打败过它，所以不可能认错。但问题来了，韩国人也从未击败过日本，日本为什么向韩国道歉呢？因为近些年来韩国人士气旺盛，同仇敌忾。全韩国看不见一辆日本车就是明证。韩国人为了抗议日本篡改教科书，可以几个人聚在大街上切手指头，中国人能行吗？你别小看这个切手指头的举动，也许正是这个举动才让日本人道歉的呢。二次大战过去六十年了，韩国还在以政府政策的形式清算和处理当年的“韩奸”。中国行吗？日本人说：我们的首相就是不参拜靖国神社，韩国人也不买我们的商品；我们的首相就是天天参拜

靖国神社，中国人照样买我们的商品。我听了这句话之后，觉得日本人真是混蛋！我有很多外国朋友，但没有一个日本朋友。见了日本人，就有一种隔膜感。

看日本的民族性，还要注意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岛国心态。现在台湾人也有岛国心态。什么是岛国心态？就是只进不退，一往无前。岛国文化不像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文化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至理名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被普遍奉行。一切都可以慢慢来。我们见人家吃饭时，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您慢慢吃。”送人出门时最爱说的话是“您慢走”。这一点日本人就非常不理解。为什么要慢慢走呢？快点到目的地不是好干事吗？为什么要慢慢吃呢？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工作，干嘛要慢呢？拿朝鲜半岛来说，每一次外国军队在仁川登陆，都意味着朝鲜命运的改变。第一战往往是背水一战，

或者是最后一战。我们不一样。我们的幅员太辽阔了。我们看中国是一片大陆，但在美国人心中早就想通了，中国是个东亚大半岛。如果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半岛的话，我们的心态可能会改变一些。

美国人不仅对中国认识深刻，对日本认识也深刻。美国并不特别看重中国。对比了三种文化之后，你认为美国还会有多看重中国吗？它为什么要看重你？中国太会内耗了。美国并没有把战略重心移到中国来。2001年我在国防大学上学时，曾和几个教授发生争论，他们说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来了，我说没有。从我们争论之后到现在五年过去，美国在欧洲和中东地区打了好几仗。现在它更不会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来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世界上只有一个货币结算单位，美元。美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办法之一就是印票子。全世界都得

用美元结算。但现在不用了，欧元横空出世。欧元的结算当量是二十万亿，与美元基本持同。很多国家不用美元结算了，改用欧元。北朝鲜就用欧元结算。美国打击南斯拉夫就有打击欧元的意图。欧盟反对伊拉克战争也是为了保护欧元的地位。若以为欧盟是为了保卫伊拉克，那就错了，是为了保自己。

美国非常清楚，现在也好，将来也好，他要在亚洲当霸主，威胁最大的就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其中尤为日本最可能。所以美国始终死死地看着日本，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像什么呢？有点像刘伯承在淮海战役中讲过的一句话，叫“夹一个，看一个，吃一个。”夹哪个呢？夹日本。看哪个呢？看着中国。吃哪个呢？有可能要吃北朝鲜。很多人认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重点是中国，才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这把问题看浅了。美国是要想中日互制，然后再

分别制之。它既利用日本来压制中国，同时也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美国制定战略的时候往往能看十几步，看到明天到后天甚至看到一年。美国知道以现在的形势，靠中日任何一国的力量都不可能对美国在亚洲的霸权造成威胁，但中国和日本一旦联手，一定会对美国的霸权地位造成威胁。

有一次，我对一个韩国朋友谈及这个话题，他笑了：“中日联手？怎么可能？”是啊，谁都觉得没有可能。我说：你别笑，我给你分析一下。现在世界有两大货币结算区，美元区和欧元区，有没有可能搞第三个结算区呢？如果有，从经济角度看，只能在东亚。从政治角度看，也只能在东亚。日元、港币、新加坡元、韩元，都是世界上坚挺的货币。××币后来居上，也硬得像吃了“伟哥”一样。这些货币如果联合起来，搞一个“亚元”，那就三分天下了。韩国朋友眼

睛发亮，一拍大腿：“好啊，你说得太对啦。而且，这些国家都是受儒教熏陶的国家，同属一个文化圈，更容易联合。”我说：“错。恰恰因为这些国家都属于儒家文化圈，才更不容易联合。”他愕然。儒家文化是一种内斗的文化，以大一统的形式进行内斗。形式上也许大一统，内心却四分五裂，所以不会联合。

我们能看到的，美国人也一定能看到。甚至比我们看得更深刻。美国不停地挑唆中日互斗，正是为防范中日联手。中国和日本真的要是能够联合起来，全球的政治势力就要重新洗牌。但是美国人狡猾。美国人防着这一手呢。同时，无论现在在中国，在日本，谈中日联手都不可能，因为没有这种土壤。日本不用说了，右翼势力那么嚣张。在中国，反日情绪高涨。我讲这个问题，也只能闭着门讲。你若在网上或在报纸上谈这些，骂死你！然而，骂我也要讲。我是

为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这样做的。同志们，我是有点预测功能的。我不是气功师的那种预测，我的预测是建立在大量学习和对政治形势分析的基础上的。1988年底，我给中央写信，预见到如果再发生学潮，非动用部队不可。一个副总长看了我的信，批了四个字——“危言耸听”。可是怎么样？半年后，“六四”发生了。我说戈尔巴乔夫要搞多党制，结果三天后他就这么做了。十多年前我就预见到民进党可能会执政，也是在一份材料中说的，白纸黑字。事实证明了我的预测是对的。

美国对中国有太多的牌可以出，中国对美国则缺少好牌，更缺少王牌。美国针对中国的发展速度一张一张出牌，前段时间出台湾牌，这段时间先把台湾牌放起来，它打的是日本牌，但日本还不是美国牌局中的大王，可能是小王，或者是J，打“双抠”不是打J吗？美国

对中国的王牌到底是什么？是民主牌？是新疆牌？是西藏牌？是人权牌？是民运牌？是选举牌？我还在观察。但日本肯定是它的一张牌！今天在中日争端中美国站在日本一边，但明天它有可能站在中国一边。它在冷眼旁观。日本占了上峰，它就会帮中国一把。中国占了上峰，它就会帮日本一把。它不会让日本垮，也不会让中国现在垮。谁垮都不符合美国当前的利益。谁强大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中日死死咬住最符合美国利益。美国不会允许中国和日本之间出现胜利者。只要我们和日本就这样互相死死地咬住，永远也超越不了历史的仇恨，谁也成不了世界大国，永远在亚洲当二流国家，不信，咱们二十年以后再看。中美日三条关系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三边关系，同时是最不稳定的三边关系。这是美国造成的。要搞好中日关系，必须要冲破美国的制约。打蛇还要打七寸

呢。美国是日本的“七寸”。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看到这一点的。从毛主席、周总理到邓小平，都主张中日友好。他们就是看到中日关系中复杂的背景，以及中日友善的重大前景。

日本应当有勇气对美国说“不”。中国应当有勇气对自己说“不”。这是何意？批评完日本，还得做自我批评。将来世界局势会向哪一方面发展，我们心里没数，只有冷静观察。冷静需要理智。理智需要宽容。群众抗日的热情是一定要鼓励的。但是，不冷静往往会造成大害。历史当然是不能忘记，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没问题，但是，过分地纠缠历史是一种心理疾病。今天的情景很像什么时候？很像“12·9”。那时群众的抗日热情多高啊。结果怎么样？正当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除了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外，绝大部分人都作鸟兽散。我们人民对日本的心理

是非常不平衡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击败过日本。泱泱五千年大国，一百五十多年来跟日本打了这么多仗，没有打胜过一仗。屡战屡败。你好意思吗？我们为什么对美国没有这种情绪呢？因为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同美国人打了个平手。我们对美国人的自信完全建立在朝鲜战争和局的基础上。但对日本就不行了。对日本没有这种自信。不自信就造成了愤怒，愤怒就造成了不理智，不理智就造成了失态。一百多年来我们对日本大部分时间是在控诉，其它时间在遗忘。讲心里话，我们有那么多国耻日在提醒我们啊！“9·18”，“8·13”，“7·7”，南京大屠杀。没有一个民族有这么多耻辱日。

日本确实是我们的敌人，我在多少作品中都始终贯彻这个观点，但日本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不要贬低敌人。贬低敌人等于贬低自己。我一方面深恨日

本人，恨他们侵略中国，一方面又恨自己，恨自己的民族不成钢。1996年日本广岛亚运会时，六万人的会场，散去之后没有一张纸。有人讲：可怕的日本人。你看看我们，国庆也好，元旦也好，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人散去以后，垃圾和塑料袋满天飞。我不知道你们前几天注意到一个新闻没有？“五一”长假那几天，天安门广场日产垃圾多少吨？十九吨！每天都是。报纸上都登了，不是我编造的。欲哭无泪！日本人为什么敢欺负你？还不是感到你有可欺负的地方。你砸日货又能代表什么？砸日货还不如砸水货。这种宣泄是一种不健康的情绪。我们军人，特别是高中级干部，不能被民间这种不健康的情绪牵着走。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了青岛，在主要路口设了一个岗，中国人从那个岗经过的时候，除了查你的良民证以外，日本兵还摸你的心口。如果你心跳加快，就说你

不是良民，拉到一边就砍掉了。所以中国人路过这个岗的时候无不点头哈腰，太君长太君短，丑态百出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这个岗撤掉了，日本人缴枪，列队出城。我们青岛市民个个义愤填膺，又是吐唾沫，又是扔石头的，又骂又打。被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从大街上走过，脸上挂着血，挨着砖头挨着石头，个个还走得挺精神。一个老人实在看不下去了，说：你们当年都干嘛去了，你们怎么不参加游击队呀，现在你们倒都成了英雄。二战结束后日本解散了七百万军人，美国对这七百万军人的评介是“秩序井然，人人安全，士气昂扬，组织犹在。”你解散七百万别国军人试试？

再说说游行。李敖讲过这样一句话，表达忠心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魏忠贤式的。魏忠贤是明末的大太监，为了摆脱贫穷，一刀把自己的根给割了。第二

种方式，剃指头，像韩国人为抗议日本人篡改教科书所做的那样。第三种也是最廉价的方式：游行。我们的老百姓特爱游行，为什么呢？游行是大呼窿，大集会，组织者都在背后。人山人海，法不责众。游行是“街头政治”。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民都爱搞“街头政治”。这早被美国利用了。“街头政治”已成了美国支持别国反对派夺取权力和建立亲美政权的得力工具。近几场“颜色革命”都曾以“街头政治”的形式演出。我们应予以警惕。

中国现在存在着一个问题：“两恨”——恨富人、恨能人。如果你很有才，你就要小心了。你是个能人，你是个有才华的人，你在这里不一定能生存。我曾经讲中国文化是一个扼杀天才的文化。哪个天才能顺顺当当地冒出来？都给我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许多父母教育孩子时都说，到了社会上一定要夹

着尾巴做人。恨能人，也恨富人。为什么中国这么多富豪被杀掉了？文化因素使然。当然，很多人富得不当，富得有问题。中国农民不得了啊。中国农民挨打挨骂，蹲在那儿不动，吃苦耐劳，站起来就杀人。所以你别让他站起来，只要站起来就杀人，中间没有任何过程。在“两恨”之中一定包含有“两暴”：暴政与暴民。中央这次处理对日问题是非常正确。不能让群众这种不良的情绪往下发展，力戒被人所利用啊！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不仅要反对专制和暴政（在中国近代，就是国民党的暴政和“四人帮”的暴政），也要反对暴民。暴政和暴民是有联系的。在暴政的统治下只能产生暴民。暴民推翻了暴政照样实行暴政。这正是中国历史无法向前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现在应特别警惕“网络暴力”。网络有法西斯化的倾向，同时民间有法西斯化的倾向。你看网络上那些愤

青，说的都是什么乌七八糟的话！一忽儿要血洗台湾，一忽儿要轰炸东京。或者把日本女人都干了。网络本身是先进的东西，现在却被用来骂人，当然是匿名骂人。在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期间，我国网站 BBS 上出现了大量针对赖斯的种族歧视的脏话，其用词之下流，令人不忍复述。我讲过一句话，美国人是想打谁就打谁；俄罗斯人是谁打他他就打谁；中国人是谁打他他骂谁。你不打他他也骂你。但是反过来看一看美国和日本的网络，很少骂人。他不骂你，顶多说你几句风凉话，或批评中国的政策。他为什么不骂你？因为他觉得你不是和他在一个等量级上，不值得骂你。强者是不骂人的，只有弱者才骂人，而且用最难听最肮脏的语言骂人。狮子无语。森林之王永远是眯着眼睛懒洋洋地躺在那里，而一旦行动，如闪电，如风暴。只有乌鸦和麻雀永远在远处聒叫个不停。

当然，目前在全国各地爆发的反日游行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我听说，有的学生到日本使馆转了一圈后，回到校园，立即召开庆祝胜利大会，喝酒吃肉。他们庆祝什么胜利呢？是钓鱼岛收回来了还是日本政府认错了？都没有。那庆祝什么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更隐秘的问题了。反日游行实则是一种压抑情绪的总宣泄，只不过这种宣泄被戴上了一顶冠冕堂皇的红帽子。在激情中宣泄郁闷。人们为什么会郁闷呢？因为压抑。哪些方面呢？弱势群体有压抑。知识分子有压抑。媒体有压抑。学校有压抑……游行展示的是一个被压抑的社会。游行中那么多不理性的行动，其实就是民间情绪的一个出气孔。爱国激情的背后隐藏着被压抑的悲情。怎么办呢？这就又涉及到我经常讲到的话题：政治体制改革。今天就不多说了。

二、台湾问题

这几天，两岸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连战、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造成了“连宋旋风”。这无疑是中国人之间的大事。是不是世界的大事，尚需观察。美国人和日本人就很低调。在我们这儿可不得了！北京市王岐山市长跟我讲，连战和宋楚瑜访问北京，警卫是“一级加强”。“一级加强”是什么意思？就是警卫不封顶。“一级加强”一般是对重要的外国元首才用，比如美国总统。恐怕一

般小国元首还享受不了这种待遇。而连战、宋楚瑜是什么人？不过是中国领土上的两个小小的在野党的党魁，竟给了他们那么高的礼遇，可见我们重视的程度。中央这一手漂亮啊。有点像当年毛泽东主席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一夜之间，地球被撼动。“连宋旋风”当然谈不上改变世界局势，但改变了台海的局势。这一回大陆是主动出击了。过去我们总是在接招。李登辉、陈水扁不停地变换花样，我们总是接招，相当被动。这一次角色转换了。同志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连战在南京机场落地时讲了一句话：“我们的胡总书记。”“我们”这两个字用得好！“我们的胡总书记！”这说明他们对大陆的认同，更说明了中央对台政策的正确。昨天，香港和台湾登出了一篇文章，我念一下：

解放军将领刘亚洲促成连宋登陆

联合早报五月三十日讯：消息人士透露，中国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宋楚瑜访问中国大陆，是解放军空军副政委刘亚洲通过军方高层人士，向北京最高决策层提出的建议。

报道引述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中国高层官员透露，刘亚洲当时还提出进一步邀请陈水扁访问大陆，但这个建议是否被采纳，不得而知。

据指出，刘亚洲撰写了大量有关国家战略、军事战略著作，其中不少文章在海内外引起回响。他也撰写过多部关于两岸问题的著作，其中《对台作战：战略评估》、《金门战役检讨》、《西部论》最著名，《大国策》和《大战略观》也有大量篇幅涉及台湾。

刘亚洲认为，中国现在最大国家利益不是立即统一，因为统一的时间尚不

成熟，而是发展和阻止“台独”；反“台独”要在国家发展中进行；如果为了反“台独”，牺牲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即使把台湾收回来，大陆也不是没有分裂的可能。

北京有关人士透露，刘亚洲个性鲜明，敢做敢为，他有许多类似“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经典名言广为流传，另外包括“大国以世界看一隅，小国以一隅看世界”等。

消息人士说，这个四季不穿袜子，下部队必定和士兵一起睡木板床的将军，一直对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保持关注，并在考虑战略问题时，彻底排除“不知不觉将战略问题降格为双边或多边问题的倾向”，始终把握住全球竞争的战略局势。

同志们，给你们讲实话，这回我还真没有向中央提什么建议。我不敢掠人

之美。很多领导同志对我讲，你什么都好，就是要少说少写，老老实实抓部队工作。我说：是！一定老老实实抓工作！我不说也不写。十年来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东西。所以我这次什么话也没说。邀请连、宋来访的建议，是一位负责对台事务的首长向中央建议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位首长对我说：“我之所以能提出这个建议，是汲取了你的思路。”我一直关注着台湾问题。1978年大学毕业我分到空军联络部，就负责研究台湾问题。二十多年过去了，从青丝到白发。现在台海出现了这样一个可喜的局面，我内心非常高兴。我的一些观点确实被上面采纳了。我在很多年前就提出，不要笼统地提对台作战，那样就不加分辨地把所有的人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台独”分子永远是我们敌人，但是大多数台湾同胞，包括广大台军官兵都是我们的兄弟。“台独”和台湾不是一

回事。去年，中央把“对台军事斗争”改为“反台独军事斗争”。莫小瞧这一字之改，它赢得了许多台湾同胞的心啊。我谈三个问题：

第一，内战

台湾问题是内战的延续。为什么说它是内战的延续呢？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留下的尾巴。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家务事。美国人不能管。日本人也不能管。谁都没有权力管，只有中国人自己能管。这次连、宋访问大陆，体现的正是一种“家务事”精神。家务可以闹，但再闹也在家里，最后结局总是和。1949年毛主席本来是准备一鼓作气拿下台湾的，但金门战役的失败改变了历史。1949年假如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海峡了，台湾今天当然在中国人手里。1949年解放军没有跨过海峡，台湾在谁手里呢？我常用这个问题问别人：台湾在谁手里？台湾在美国人手里吗？台湾在日本人手

里吗？台湾在菲律宾手里吗？不在。台湾在谁手里？台湾在中国人手里。陈水扁再坏，中国人。吕秀莲再坏，中国人。蒋介石、蒋经国再不怎么样，中国人。李登辉当然有可能是日本人了。对吧？岩里正男嘛。所以这次连、宋来访，李登辉表现最坏，比陈水扁还坏。因为触到了他这个外国人的痛处。他干的事不像中国人干的。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或者是其它政府，或者是台湾的军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敌人，但再坏也是中国人。“台独”的性质和当年国民党的性质完全不同。它要把台湾分裂出去，因此它不光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敌人，还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整个中国人民的敌人。但“台独”分子也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或美国人。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界定下来。要承认这一条，把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才能把整个框架限制在内战的范畴里。

只要严格地把台湾问题限在以上框架中，事情就好办。“一百年不解决，一百零一年总要解决吧。”这大概是毛主席的话。此次连、宋来访，最伟大的意义也正在这里。这比具体谈点什么东西，或进行一些所谓的“实质性”交往，都有意义得多，也重要得多。

当然，说到内战，我再做点自我批评。我这个人奉行一条原则：批评和自我批评，表扬和不自我表扬。批评自己可以，表扬别人可以，但不要表扬自己。美国为什么强大？两百年来就打过一场内战。日本为什么强大？一场内战也没打过。你看我们打了多少内战？我们太爱打内战了。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哪里不是打得头破血流。有一句话叫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谁发明了这句话，真该给他发个诺贝尔语言奖！同志们听说过“美国人不打美国人”这句话吗？听说过“日本人不打日本人”这句话吗？

听说过“菲律宾人不打菲律宾人”这句话吗？没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中国人老打中国人。这真是要作自我检讨了。为什么我们社会上的人际关系那么险恶？为什么我们老需要相互防范？是中国人不善良吗？我记得国外有这样一种评论：中国人在大街上看人，先把人看成坏人，然后再分辨这些坏人中哪些是好人；外国人看人呢，首先把人看成是好人，再从中分辨出哪些是坏人。这话当然偏激了，我们不能完全接受，但是这种评价反映了我们一种人际关系。改革开放初期，出过国的同志都有一个感觉，不管你到哪儿，非常容易把中国人认出来。这不仅是因为你身上穿着皱皱巴巴的西装，不仅是因为你头上没有抹油，不仅是因为你的眼镜上还带着一个商标，或者是你穿不得体——最不得体的穿着就是西装里穿毛背心，再把领带塞进毛背心里——

只要是这种穿法一定是中国人。不是因为这些，那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是中国人的眼神。中国人目光里有一股相互防范、相互提防的神色。同志们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人与人之间设防啊。为什么我们之间不能相互沟通呢？我每到一个单位，无论是常委会上讲话还是讲课，讲完之后你们都有一种感觉，我把自己坦坦荡荡交出来。我放在这儿你怎么解剖都可以。这就是我。我用自己的行动来表现一个“真”字。

中国社会的形成是与文化有关系的，不能全推给领导者，更不能推给一场运动，譬如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人际关系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中国文化的形成是几千年的事情了。首先，它与地理环境有关系。中国自古以来，生存环境很险恶，缺水，同时要治水。治水则需要大规模的群体。大规模群体需要强有力的指挥。人力、物力，集中指挥、统一

指挥。这样我们的文化形成了一种专制。其次，小农经济。小农经济追求的是小富即安，保住自己。很多农民的目光永远离不开一亩三分地。很多人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乡里。但由于生存环境恶劣，要护住自己就要扎紧篱笆墙。缩小到农民，就是盖院子。北京人盖四合院。放大到国家，就是筑长城。同样，由于生存环境险恶，扎好了篱笆墙还不足以生存，就得从别人那里再抢一点。所以，篱笆墙内争斗不断。缩小了看，为一堵墙也要吵架，打官司。“千里书信只为墙，让他一尺又何妨”。放大了，我得吃掉你，你得依附我。这种思想，在这样一种小自然农耕文化的情况下，造成了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紧张。这就要求协调人际关系，稳定内部。越想稳定越稳定不了，发展到最后就是一个字：乱。乱了又需要什么？需要统一，这个时候就呼唤秦始皇式的君主。这就是文化。中

国人的聪明才智只能集中人与人斗的技巧方面。统治者所有的精力就都集中到控制老百姓上面，百姓则把精力集中在对付身边的人身上，难以抱成一团。再加上儒家文化推波助澜。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心灵杀伤力特别大。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看看《论语》把中国治成了什么样子了。现在所有的问题，一动就动到了文化上，一追问都追问到文化上。看起来是制度，其实不完全。制度是谁选择的？制度也是人选择的。你要往下拷问的话，所有的问题直指文化。

今天，最渴望在台湾海峡看到一场战争是谁？是李登辉，是陈水扁和吕秀莲。陈水扁、吕秀莲，虽然是中国人，但他们是中国人当中最坏的一批人，早就不分是非，颠倒是非。颠倒黑白最成功的不是颠倒黑白，而是没有了黑白，他们天天在说谎骗人。一个人撒一两次谎是容易的，难的是一辈子撒谎。他们

一辈子都在撒谎。他们继承了中国文化中最坏的东西。最坏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小农思想。小农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农民要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当家作主。陈水扁和吕秀莲包括李登辉，他们就是放大的农民。台湾岛虽小，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当家作主。这种心态还不光是他们有，恐怕中国很多人都有这种心态。因此，你要在你的土地上当家作主，我就要在我的土地上当家作主。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

第二，处理好加强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和慎重动武的关系

当年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之前，毛主席说过这么一句风趣的话：长江我们是一定要过的，无非是两种过法：一种是唱着歌过，一种是打着炮过。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套用这句话：台湾海峡我们是一定要过的，无非是唱着歌过，或是打着炮过。现在看来，中央对台湾实

行了两手，一手是和平统一，一手是军事斗争准备。两手都很硬。台湾局势发展到今天，与中央的决策正确密不可分。

我们是军队，军事斗争准备不能放松，退一步讲，即使没有台湾问题，也要做军事斗争准备。这十年来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军队是需要敌人的。你要有个对手放在那里，要不你没有目标了。兵练好了，可以用在台湾，也可以用在别处。三十一军可以解放台湾。三十一军也可以解放钓鱼岛嘛，也可以解放南沙群岛嘛，对不对？

袁崇焕当年镇守宁远时，曾向崇祯提出对后金国的两项策略：和是正着，战是奇着。袁崇焕是在对清、明两国的大势进行了深刻分析后才做出这种判断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崇祯没有采纳袁的意见，最后亡了国。今天，对台湾来讲，和平统一是正着，战是奇着。这

一次，连战、宋楚瑜来访，就是与中央和平统一台湾的政策密不可分的。没有人能够超越历史。也没有人能够不被历史所超越。但是直到今天历史还在邓小平这一边。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这次连战宋楚瑜来访，既昭示着台湾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愿望，又是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伟大构想的体现。

我在《大战略观》一书中写道：二十一世纪我们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的安全战略谋划必须围绕这个核心来展开。那么现在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呢？最大的国家利益有两个：第一是发展，第二是阻止“台独”。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主要问题是发展。你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不发展。因此，发展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讲不是是不是最佳战略选择的问题，而是必须选择的问题。同志们，发展和

统一是两个国家目标。第一个是发展，第二个是统一。这两个国家目标不可能同时得到，但是可能同时失去。这个意义你们可以理解。我认为，必须在两个国家目标中做出痛苦的选择，到底是发展还是马上统一？反“台独”那是另外一回事。痛苦的选择也许是正确的选择。人生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得到你想要的，一个是享用你所拥有的。只有聪明的人才能做到第二条。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湾问题不是我们的战略核心。如果把台湾问题当成战略核心，你的战略核心就出问题了。战略核心是什么？你的战略核心是发展、是经济。当然这不意味着不反“台独”。“台独”必须要反。在处理发展与统一的问题上有三种选择。哪三种呢？第一，在发展前解决统一问题，第二在发展后解决统一问题，第三在发展中解决统一问题。第三种现在看来是必然的选择。

台湾问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祖国必须统一。在这个大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讨论。在讨论中有一个问题要特别注意，就是要容忍不同的声音。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可以反对你的思想，但我不会禁止你开口。一般来讲，有两种之争：一种是思想观念之争。这种思想观念之争应当是“君子之争”——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绝对维护你说话的权力。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垮在什么地方呢？垮在权力的垄断、财富的垄断、思想的垄断。思想的垄断最要命。毛主席说：让别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理解，不让人说话，天就会塌下来呢？中国共产党从事的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这个事业代表着未来，代表着希望。这个事业绝不是狭隘的，而是具有大包容心的。它不怕反对。只有非正义的东西才害怕反对。正义的东西你越反对越就显出它的正义。鲁迅先

生就是这样，你越反对就越显出他的伟大。第二种之争，就是权势之争。就这么一个位置，就这么一个官职，大家都来抢。你吃了，我就得饿着；我进来，你就在外面呆着。这种争，与观念之争不同，是另一种性质的争。如果前者是君子之争，后者则是赤裸裸的小人之争。我们应该提倡前者。大胆地在思想上容忍不同的声音，这一点非常重要。集思广益嘛。重大的政策、重大的决策，要讨论、要听取不同的意见，要容纳不同的意见。你们是搞学术的，大学最重要的是宽容的精神。同志们知道天安门前面的华表是什么呀？华表过去叫“谤木”，尧舜时期就有了的。“谤木”的全称叫“诽谤之木”。人民到了皇城门前可以把他想说的意见包括对皇帝的批评写到木头上面。最后演变成了华表。要让大家讲不同的意见。真正好的东西可能蕴藏在反对的意见之中。学术也是这样。

日本问题的根子是在美国，台湾问题根子也在美国。中美关系事实上就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中国和美国真正的较量，目前是围绕台湾问题展开的。胜负也可能由台湾问题的解决来决定。从目前的情况看，台湾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利用了各方面的复杂矛盾，安排了一出好棋。它一定要让台湾跟大陆闹。它要让台湾闹到大陆不得不理的程度。为什么呢？籍此来消耗掉大陆非常有限的资源，包括外交资源。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和日本最希望我们因为台湾问题打得一塌糊涂。讲心里话，谁不希望别的国家打仗呀。我们偏不能遂他们的意愿。对美国，一方面要斗争，一方面要韬光养晦。更重要的是韬光养晦，中国还得韬光养晦一百年。江主席讲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韬光养晦不是策略，韬光养晦是一项大战略。

美国对台湾有重要影响力。两岸问题核心是美国问题，这只能说对一半。我认为：中国会不会分裂，决定因素在大陆；台湾能不能统一，决定因素在台湾。这是一个内因和外因的关系问题。台湾人要统一，美国想拦也拦不住；台湾人要独立，所以才需要依靠美国。所以，在两岸决定性时刻到来以前，两岸双方必须保持低调，避免美国等国家的破坏。目前的悲剧在于台湾人民不希望统一。世界上真正希望台湾统一回大陆的国家没有。包括北朝鲜也不希望。我们希望人家统一，人家反过来不希望我们统一。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

第三，不能过高估计“连宋旋风”的影响

首先，要看到连战和宋楚瑜的访问，还是美国战略的一步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美国不首肯，此二人根本不可能来访。尤其是宋楚瑜的访问，更

具有美国背景。如果说连战的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宋楚瑜的访问则具有现实意义。连战代表的是国民党。国民党是一个有着一百年历史的老党，比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早三十年。它更是连接台湾与大陆同为一个中国的象征。国民党是维持一个中国的重要历史遗产。这也是我党在近十几年来台湾选战中一直暗地里支持国民党的重要原由。宋楚瑜美国背景很深。据说宋在访问大陆前还秘密去了美国一趟。从陈水扁对二人访问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连战来访，陈水扁在第一时间就表示了极大不满，说：“国民党已经丢了大陆，还要丢掉台湾。”而宋楚瑜出访时，陈水扁则表示肯定和支持。这里面有两点需要注意：①宋楚瑜临行前是否与陈水扁达成了某些默契？②宋楚瑜能够成为中美间沟通台湾问题的桥梁吗？我们现在应当研究的是，为什么美国会允许连宋

访问大陆。按说，美国是支持民进党的，可是连宋访问大陆后，民进党陷入空前的困境。“连宋旋风”之后，大陆频频向台湾摇曳善意的橄榄枝。台湾接不接受？如果接受，功劳是连宋的，是泛蓝阵营的。若不接受，罪过则是民进党的，会遭受到工商界及民间的强烈反对。美国人事先当然看到了这一点，可它为什么会允许这种局面发生呢？美国下一步要干什么？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台湾问题面临的国际格局未变。

其次，连战和宋楚瑜均是在野的国民党和亲民党主席，手中无权。他们访问大陆获得成果仅具象征意义。我们必须对台湾岛内的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台湾问题不仅不是连宋访问所能解决的，甚至不是陈水扁来访能够解决的。既不能对在野党抱太大期望，甚至对执政党也不能抱太大期望。眼睛盯着美国。期望放在台湾人民身上。刚才香港那篇报

道中提到我曾建议邀请陈水扁来访，说得不错，我确实建议过，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陈水扁不是没有访问大陆的可能。先让我来分析陈水扁的性格。此人功利心很重。他和李登辉一样，都有很强的历史感。李登辉想当台湾的摩西，陈水扁莫非没有此心？他的心大着呢。可以肯定地讲，陈水扁目前考虑最多的是他个人的历史定位，最想做的是对权力的追求，至于民进党和台独群体的利益，是瞠乎其后的问题。尼克松访华，打破了历史的坚冰，成了美国近几任总统中最耀眼的一位。虽因水门丑闻下台，但历史依然记着他，美国人民依然记着他。其葬礼极尽哀荣。尼克松的历史对陈水扁不会没有启迪。就是从民进党内部争权夺利这个角度看，陈水扁都有可能做此事。下一届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内谢长廷、吕秀莲、苏贞昌都有可能问鼎“总统”宝座。这三人如果先

于陈水扁访问大陆，都有可能获取有利的竞选资源。陈水扁不会把创造历史的机会拱手让人。陈水扁有可能自己当民进党的“破冰之旅者”。如果陈水扁有意访问大陆，最可能是明年，也就是2006年。如果推到2007年，那就晚了。

三、创新问题

我想了想，在学校里还是要给你们讲讲这个问题。这也是当前的热点。大家都在谈创新。怎么创新？为什么要创新？创新是干什么？你有什么目的？这涉及我内心一个很隐蔽的东西。人家讲，刘副政委你就不能少讲两句？你就不能少写点东西？有一些人对我不理解，但我欣慰的是理解我的人是很的。一个人有思想，想沉默是很难的。一个人没有思想，想不沉默也是很难的。一句话，

创新是为了江山永固。可能你们很少听见把创新问题上升到这个高度上来认识吧。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对这支军队、对这个党、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感情实在是太深了。我要不是感情深，大可不必这样做。我坐在这儿，放眼望去，星光熠熠，冠盖云集。可是同志们想过没有，如果共产党这条船翻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东德被西德吞并之后，东德军队中开始是团以上干部一个都不要，营以下干部可以到西国防军中来。营长们还挺得意的，嘲笑那些比他们高的军官：这下你们没着落了吧。结果，西德接收工作顺利完成之后，营级军官连级军官都统统赶离了部队。原则是：当官的一个不要，统统给我滚蛋。拿你的救济金去吧。有句心里话我想对你们说，我们在座的都是社会的受益者。受益者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我们起码要保护这个社会。我是随时准备抛头颅、洒热

血来保卫这个社会的。李瑞环同志“六四”时在天津对学生说了一句话是很深刻的，他说共产党的江山是用几百万人头换来的，你们学生想要，可以啊，拿几百万人头来换！就是说，江山来之不易，政权来之不易。无数先烈打下了江山，让我们受益。我们应当时时刻刻想到这一点。这次中央决策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就是为了巩固我们的政权。

我们吃饭了，要随时想到还有很多人吃不饱。我们穿暖了，要随时想到有很多人还冻着。前一阵子，我看到了一封遗书，一个农民叫孙宏国，他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但是他没有钱供儿子上大学，他就给儿子写了一封遗书。他写道：“我儿，当你看到这封遗书的时候，你爸爸已经走了。我实在对不起你，我没有钱供你上大学，只能以死来表达我的愧疚。”他上吊自杀了。像这样的事在社会

上并不少。令人心酸啊。生在福中的人不知道福，活在苦中的人却知道苦。你们都知道马加爵，是个杀人犯，已被处决了。他心理变态，杀了那么多人，罪不容诛。但他的心理是怎么变态的呢？马加爵被捕进入看守所，穿上囚衣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押他的公安干警都流泪了。他说：这件囚衣是我这一辈子穿的最好的衣服。穷啊！助学金没有拿到，他不敢去上课，没有钱买鞋穿。穷困肯定对马加爵的心理产生过重大冲击。马加爵的犯罪，社会也有重要责任。

你们都知道，我是有老山情结的。老山作战后，我去过那里好多次，最近还去过。是什么让我如此牵挂？麻栗坡烈士陵园埋葬着九百多位老山作战牺牲的烈士，其中三百多位烈士的家属从未来过，大部分是因为没有路费而不能前来。有的烈士家属来到陵园竟没有路费回家。可你想一想，看一看，有哪些当

官的诚心去拜过英雄的墓地？老山作战才过去二十年，就已被遗忘了。我至今保留着一些烈士的遗书。有一位烈士在遗书中写道：“如果我牺牲了，部队在埋葬我时肯定会给我换一套新军装，我家穷，好几个弟弟都没衣服穿。我恳求组织上把给我的那套新军装送给我家里，让弟弟们穿。”每读这封遗书，我的泪水都会止不住流下来。

同志们，我跟你们讲，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事。我要么想战略，要么就想这些事。我这个人不吃不喝，不占不要。我下部队，都在连队吃饭，到学校就到学员灶上吃，就是不吃酒席宴席。我的书在海外不停地再版，有一些稿费。自1999年在红安天台山捐建一座小学之后，我在成都任职期间，又用稿费在四川通江、南江各捐建了一座小学，每所小学三十万。说实话，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理世界。正因为他们不了解我，我

才不见容于他们。当然我也不容他们。人活着，为什么要别人理解？庸俗啊。尼克松早就讲过，一个人最痛苦的并不是和什么人作斗争，而是和错误的观念作斗争。

当前世界变化如飞，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们越是处在第一线的同志，越应当有崭新的观念。现在党中央，从江主席到胡主席，还有现在的军委领导，他们的观念非常先进。军委曹刚川副主席是 1935 年出生的，他到空军来考核，和我们常委谈话，他的思想先进得令人吃惊。江主席讲，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这方面，中央领导和军委领导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你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北京有个著名的“建筑之战”。与当年的“平遥之战”^[注]遥遥呼应。这次论战

[注] 1983 年，山西省平遥县委决定扒掉保存极好的城墙，建立所谓的“经济开发区”。全国建筑界精英齐聚平遥，与政府展开论战，后来终于保住了平遥古城。史称“平遥之战”。

是由新建中国国家歌剧院建筑方案引起的。安德鲁设计了一个“水珍珠”，赫然矗立在天安门广场旁边。我的评价是：原来代表北京的标志是故宫，若干年后，代表北京的标志可能就是“水珍珠”。这个“水珍珠”是个圆形，在概念上象征着开放，象征着明快，象征着清莹。水嘛！安德鲁讲，如果要反对一个传统，就应当把这个传统逼到极致。所以，这个“水珍珠”往天安门广场旁边一放，立即就显出了故宫的衰老，人民大会堂的沉重，整个广场的悲怆。这个“水珍珠”像个炸弹一样，它不仅形状像一个炸弹，本身也是一个炸弹，在建筑界引起了大爆炸。许多中国建筑界的人拼命反对。他们反对的最主要依据是：这个现代化的东西与天安门广场不协调。什么叫协调？为什么非要协调？中国建筑界认定的协调就是“大屋顶”。什么建筑都要戴个小帽子。难看死了。当年梁思

成在设计北京城时，在故宫附近搞一些相对的传统搭配，是可以的，但全城都搞这玩艺，怎么能行。这种传统观念实际是一种皇权思想。他们固守着传统的概念，实则是固守着帝王永久的边界。建筑的沉重反映出来的是传统的沉重。建筑的陈旧反映出来的是思想的陈旧。自己不能突破，借鉴一下外力有什么不好。现在北京几个杰出的建筑都是外国人设计的，比如：“水立方”、中央电视台新大楼、首都博物馆新馆、西直门交通枢纽。我当时非常担心这个方案可能通不过，因为反对的人太多了，骂什么的都有。为什么呢？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触动了他们思想深处的神经，也可以说，触动了他们的根本。但是中央硬是批准了这个设计方案。这是思想创新的一个辉煌胜利。这虽然只是一个建筑设计，但从中可以看出中央领导的气魄、胆略和勇气。毫不夸张地说，从这次“建筑

之战”中，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争论不怕。争论出真理。有人说：什么“水珍珠”？就是一口大锅嘛，反扣在那里。但我说，她不是个锅，而且绝不是个锅。敢于放在天安门广场，就是和天安门广场进行比照和对比，这就是勇气。

要有一大批坚持思想创新的人，使之成为一个军团，成为一个团体，我们这个事业才有希望。前不久空军办读书班，中央党校的一个教授讲到中国的社会结构时，打了一个比喻：中国社会结构不应当是一个“洋葱”形，上面一点点，下面非常大。意即，大量社会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人民贫困。我从这个思路延伸开来，感到中国社会结构应当是一个“红薯”形，上面小，下面也小，中间大。意即，极富和极穷的人都是一小部分，中间部分很大。中间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中产阶级。这个社会结构，也适用于思想结构。具有

创新思想的人，或者说思想活跃的人，应当在中国社会结构上占中间那一大部分，这样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当然，这个思想结构与社会结构也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一般来说，中产阶级思想既比较活跃，又比较成熟。培养一个阶层，对一个社会来讲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国家按照小平同志的思路搞经济建设，富裕的人越来越多。富起来的人越多，社会就越稳定。我们是不是在培养一个中产阶级呢？我不敢说。或者说用这个词不合适，但小平同志的思想是可以触摸的。小平同志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小平同志的意思决不是意味着让另一部分人永远穷下去，这不是小平的思想。小平同志的思想是共同富裕，关键是他找到了让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理解共同富裕就是让一大部分人有产、中产。时间过去越久，对小平同

志的思想认识越深刻。

思想观念也是这样，必须要有一个阶层，这对社会是有影响的。比如说英国，在资产阶级崛起的时候，就是培养了一个阶层——绅士阶层。别小看英国的这个绅士阶层，它绝不仅仅是在表面上看起来彬彬有礼，道貌岸然，或者用我们的话说很虚伪。除了有这些东西之外，这个阶层还具有开拓精神，冒险精神。思想特别解放，还特别勇敢。开发海外殖民地，打仗，都冲在前面。一旦有战争，这些绅士们争先恐后地上前线。如果不能冲锋陷阵，就被认作奇耻大辱。这个阶层对英国成为“日不落”的国家，奠定她几百年世界霸主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但问题也出在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绅士阶层很多人上了前线。恰在此时发生了世界上第一次技术革命，出现了不少先进武器。德国人发明了马克沁重机枪，杀伤力极大。英国

军队在冲锋时死伤惨重，绅士阶层首当其冲。英国最后的衰落有种种原因，但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绅士阶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伤亡得过于惨重。一个阶层对一个国家的兴衰，就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同志们，我提倡思想创新，我首先带这个头。让每个人做到的，我自己首先做到。你希望别人容忍不同意见，你首先要容忍别人的不同意见，首先要接受别人的批评。你要别人敢于把不同想法说出来，首先自己要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

第一，制度的创新

一个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干好事，一个坏的制度也能使好人干坏事。西方人是罪感文化，律己是极严的。但如没有制度约束，仍然会出问题。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深圳罗湖桥的边防联检大楼，连接着大陆与香港。在大陆这边，过关

排队秩序很乱，插队，占位，抢，挤。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摸一样，能抢就抢，能挤就挤，甚至比中国人还起劲。但一过罗湖桥到了香港那边，马上就变得老老实实，绝不敢乱挤乱跑，该怎么排就怎么排。你看，同样是一个人，一过这条线，他就变得老老实实。这一道界线就是制度的力量。他不敢动。再说汽车。全国各地的车，最不守法的是军车，其次是外国使馆的车。但是外国使馆的车在外国是非常守法的，到了中国，他就不守法。你的制度没有约束他。很多问题就出在没有制度上，或出在制度不落实上，或出在制度不深入人心上。制度深入人心是怎么回事？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想着它，它也能制约住你。什么时候中国有一种好的制度，什么时候这个好制度能够深入人心了，中国的法制社会建设就算完成了。中国只有建立起完整的法制社会，才算真正走进现

代化，才算真正文明起来。在美国，它的制度是深入人心的。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青年人去抢一个商店，让店老板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东西都拿到了，最后用手枪指着店老板说：你把那瓶威士忌也给我拿过来。店老板说：“那不行。”这是为什么呢？你不到十八岁。美国法律规定不到十八岁不能饮酒，我别的东西可以给你，但酒不能给你，给了你我就触犯了法律。这是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在枪口顶着胸膛的情况下，他还能做出这种反应，就是制度深入到人的血液中了。接下来就更有趣了，那个青年劫匪说：不，我已经到了十八岁了，不信，你看我的身份证，他竟把身份证拿出来给店老板看了。后来这反而成了破案的线索。这两个人虽然代表的是一黑一白，但都反映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制度深入人心的问题。我们有很大差距，要下功夫啊。当然，他们有些制

度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日本人砍树犯法，因此没有人砍树。自己的树不砍，可是让我们给它制造一次性筷子。现在，中国也开始加入掠夺世界资源的行列了。中国现在很多实木地板、家具，都是从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进口的原木做的。

最近胡总书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我在考虑，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呢？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和谐吗？什么地方不和谐？肯定是与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关系不和谐，与世界主流文明不和谐。构建了和谐社会，下一步干什么呢？在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中，有没有可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看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政治体制改革没多大关系，其实不然。你看，怎样才能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就是扶助弱势群体，制约强势群体，这样才能和谐。可用什么制约强势群体？中国目

前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强势利益集团同权力进一步结合。强势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强大控制和垄断能力，对普通公民的发展权形成了巨大压力。压抑强势群体，只能用民主和法制。这当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

我们绝对不能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小平同志是准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小平同志从来不回避这个问题，但由于发生了“六·四”，小平同志的时间表、路线图发生了变化。正因为发生了变化，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片处女地。你想想看，小平同志如果再把政治体制改革也搞了，那我们就什么也不用干了。美国的宪法是五十五人制定的，是五十五个最聪明的人制定的，而由所有笨蛋来执行，都没问题。真正管用的宪法就是由聪明人制定，但不聪明的人也能执行的东西。如果小平同志连政治体制改革也搞了，那我们就真的坐享其成了。我们今天的

一切，都是小平同志给的。我们当然感谢毛主席，但我们更应当感谢邓小平。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毛主席给邓小平留下了空间。邓小平给我们留下了空间。所谓空间，就是给我们留下了创业的机会。

实践“三个代表”伟大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是一次伟大的创业。这些都是前无古人的伟业。构建一种完美的社会制度，也是创业。创业艰难百战多。打江山是创业，巩固江山何尝不也是创业？后者不一定比前者容易。二月河讲，一个人的成功要靠“三气”：一是运气，二是才气，三是力气。在这“三气”中，最要紧的是力气。一个人一辈子如果想干成一件事，只要肯下力气，没有干不成的。一个制度的建立也要靠这“三气”，最重要的仍然是力气。当然，我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社会稳定大前提下的改革。中央反复

强调，稳定是当前的大局。这是非常深刻的。中国不能乱。中国又不能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怎么办？我认为应当像鸭子划水。此话怎讲？你看鸭子在水面上游得优哉游哉、非常平静，几乎不起涟漪，但是鸭子的脚却在水下拼命地划动。只有拼命地划动才能维持上面的平静。我的意思就是，维持社会的稳定是大局，任何地方不能乱。但是，不能因维持大局，你啥都不动了。

我作为空军的纪委书记，今年抓了一件事：纠正士官选改工作中的不正之风。纠风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建立一种制度。现在部队中士官选改的问题最突出。士官选改工作成了市场。每当这项工作开始时，有的单位就说：“我们的发财机会到了。”士官明码标价，一级多少钱，二级多少钱，三级多少钱。选改了就把钱收下，选改不了还退钱。颇有“诚信”啊。部队成了这个模样，怎么打

仗？干部跑官送点钱，那钱可能是干部自己挣的，或者用你的权力弄来的。战士们送钱，钱从何来？只能从父母那儿来。因此，伤的是父母的心，伤的是地方老百姓的心啊。谁都知道这件事，谁都不敢碰。我偏碰。乔司令员、邓政委对我非常支持。军委首长和总政首长也支持。这件事不获胜，决不收兵。

第二，改变民族精神也是创新

刚才讲了制度问题，但是制度后面是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现在缺什么东西？我认为是精神，我们太缺乏那种强悍的、一往无前的、曾经使我们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已经离我们远去的精神。最近中央军委提出一个命题，叫培育战斗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精神上的东西太重要了。要么它给你无穷的力量，要么它给你无穷的灾难。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李际均，原军委办公厅主任，曾任三十八军军长。李际均五十年代初入伍。粉

碎“四人帮”后，王任重同志向邓小平推荐此人是个人才，邓小平说：“好，既然是人才，就大胆用。三年师长，三年军长，以后再看。”好大气魄！李际均在二十四军当了三年师长，在三十八军当了三年军长。当军办主任后，又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有一次，接待一个美军代表团。美军一个上校说：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搞不懂，朝鲜战争时，你们装备那么差，为什么我们打不过你们。你们三十八军强渡汉江时，大冬天，零下40度，你们战士出水的时候，裤子都冻成硬梆梆的直筒子，还发起冲锋，我们都看呆了。李际均说：“我曾是三十八军军长。”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个美军上校立即起立，双腿一并，敬礼，说：“我对三十八军非常崇敬！”

我曾在成都军区空军任政委。成空某师曾出过一次全空军最严重的飞行事故，就是空军史上有名的“6·24”事故。

当时该师组织跨区机动训练，十四架飞机编成四个梯队。16时24分，第一批飞机从湖北某机场起飞，16时59分，第四批起飞。第四批飞机于18时10分到达机场上空时，机场已全部被雷雨覆盖。这次事故导致三架飞机坠毁，两名飞行员牺牲。十四架飞机除了第一批两架歼教六飞机外，十二架歼六甲飞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损伤。这是我军历史上损伤飞机最多，损失最严重的一次事故。目睹过事故现场的人，都不愿意再回忆这惨痛的一幕。当时机场上空乌云翻滚，雷声大作，大雨瓢泼。经历过这次事故的人形容，“狂风夹杂着雷电的轰鸣，雨水好似用盆从天上往下泼似的，令人感到恐惧。”参加这次转场的飞行员在极其恶劣的气象条件下，不顾个人安危，想到的是国家财产和战友的生命。空中一个雷将飞机击中，飞机迅速变态、掉高度，顷刻间飞行员又将飞机操纵到正常状态，

反反复复。飞行员个个英勇顽强，没有一个人屈服，没有一个人失去信心，也没有一个人弃机跳伞。带队干部都自觉地指挥部属和新飞行员盯住我，我先着陆，你们紧跟在后面着陆，致使着陆间隔非常小，前机接地迅速脱离跑道，给跟在后面的飞机让出跑道。由于天气特别复杂，一时无法着陆，滞空时间长，飞机剩余油量告警。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干部让部属，老员谦让新员先行着陆，坚持到最后的副团长和副参谋长空中油量为零，飞机接地发双随即停车。当时，老百姓都冒着瓢泼大雨在跑道两边观看。虽然这是一次严重的事故，但是表现了中国空军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一直到最后一架飞机落地，老百姓都欢呼啊。那场面是非常感人的。现在我们飞机是很先进了，但这种战斗精神可能没有了。

道德属于精神范畴。我们进行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触及

到一个问题，就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一个人应当成熟。但成熟不等于城府。成熟令人亲近，城府令人害怕。一个合格的、保持先进性的共产党员，首先必须是一个好人，一个人格上合格的人。人格是人的身份证。人格是最高学位。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潮下，社会思潮涌动，人欲横流，这个问题愈显得突出。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厚道的人，这个命题相当严峻。每个人都应该提倡一种自问精神。做每件事情，你都要问一问：十年后敢不敢见人，百年后敢不敢见鬼。人是需要有恐惧感的。不是恐惧敌人，而是恐惧自己灵魂中的污垢。人应当在自己灵魂中的污垢面前恐惧得发抖。恐惧是进步的动力。而我们中国人总是对暴政恐惧得发抖，就是不对自己恐惧得发抖。关起门来讲，我们有些部门风气上是有一定问题的。每当一个位

置空出来的时候，匿名信、告状信满天飞。有些人处心积虑，削尖脑袋想当官。为了当官，不惜造谣，不惜中伤，不惜做小动作。无所不用其极！今天有些人最爱在政治上给别人“挑刺”。有些人不工作，只爱向上爬。太想向上爬的人，见到什么都想踩。见到梯子想踩，见到别人的肩膀也想踩。这种人其实政治上最不可靠。在政治上整人的人总是政治立场最坏的人。这已被无数事实证明了。这种人哪像一个共产党员？简直不是个正常的人。你说现在有些人啊，真是很恶劣。用一句流行的话讲，“肉没有了肉味，食物没有了原味，过年没有了年味，有的人没有了人味”。做人应当善良，做官更应当善良。人的最高智慧是善良。

同时，从精神上讲，我们做学问的，我们作领导干部的，还要讲真话。追求真理也属于精神问题。真话不一定是真

理，但谎话一定是犯罪。一个人讲一两句真话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讲真话。很多人生活在两副面孔中。有一个曾经几乎是统帅过我军的高级领导，退休了，在海边和人散步的时候说：“实话对你讲，这些年来，我没有讲过一句真话。”听者极为震惊。不在职的时候讲真话易，在职的时候讲真话难。也有一个曾经几乎统帅过我军的领导同志，退下来以后，写了一幅对联：早下晚下都得下，晚死早死都得死，横批：早下晚死。这是讲真话。但在台上你敢讲这样的真话吗？

小平同志讲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政党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小平同志是讲真话的代表。胡适讲：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现在的状况相反，凡是大事都是小声地说，凡是小事都是大声地说；当面不说，背后说；会上不说，会下说。我最看不上这种事。贝聿铭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建筑就像竹子，再

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但是这句话不适合我。我不是竹子。我觉得我是一棵树，来了风，树可能折断，但不弯腰。为一种信念死去是容易的；为一种信念活着是难的。形体美，吸引人。思想美，更吸引人。敞开心灵比敞开身体要幸福得多。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里，最提倡创新、最敢创新的是谁啊？是江主席。“三个代表”就是最伟大的创新。“三个代表”和过去我们共产党很多传统观念是不一样的。过去讲共产党是先锋队，先锋队只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现在我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仅仅代表无产阶级，还要代表有产阶级。这才是“三个代表”的精髓。我们理解透了吗？我们很多搞政治的同志，只知道围着领导转。出口不离紧跟高举，下笔就是世界风云。很多著作和文章都是表态性的、虚假的，没有价值的。完全没有人看。讲心里话，你写一篇文章

得让人看啊。宁可在创新中失败，不要在摹仿中成功。大学里有没有学术腐败的问题？当然有。“吃一顿饭，填补一项国内空白；送一次礼，达到一项世界领先水平。”这样下去怎么行？与其写坏书、写坏文章，不如不写。还不如老实地育人，当教师。最近，有这么一件事，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个普通老师，叫晏才宏。今年3月12日，死于肺癌，终年57岁。他的死，对教育界和中国整个教育体制造成了很大震动。不是因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是因为他仅仅由于没有论文，去世的时候还是讲师，始终没有评上职称。在上海交大，晏才宏的教学水平有口皆碑。他的电路课，在学生评教活动中，以罕见的满分居全校之首。他上课时已臻化境：一杯茶、一支粉笔随身，从不带课本和教学参考书，知识早已烂熟于胸。加上一手秀丽的粉笔字，洪亮的嗓音，他的电路课被誉为“魔

电”，几乎场场爆满。我想，这样优秀的人为什么不写论文？他写不出来吗？你说，我们有些论文有什么水平？谁不能写？我们的文章有什么水平？谁不能写？晏才宏为什么不写？是不是他不屑于写呢？当他最后知道自己得了肺癌晚期的时候，仍然去上课，非常平静。他对学生们讲：“假期的时候，我去做了检查，昨天拿到结果，肺癌晚期，这是我给大家上的最后一课。”说这话的时候他非常平静。他上课的时候从来不拖堂。那一天，那一堂课，居然没有听到下课的铃声，仍然在侃侃而谈，最后不得不放下粉笔的时候，脸上是无奈的神情，眼睛闪着泪花，对学生们说：“如果说教学是一门艺术的话，你们都是我未能完成的艺术品。”在场的学生都哭了，随后是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就这么一个人，连个职称都没有，为什么？你能说我们的教学机制没有问题吗？

真理在什么人手中？真理就在晏才宏这样的教师手中。而在专制制度下，真理就不在这些人手中。专制制度最大危害，就是包括被专制的人在内的思想的专制化。民意只剩下名义。革命只剩下外衣。中国自古以来就表现出对思想的不尊重。对思想不尊重就是对真理不尊重。官有多大，思想就有多大。一把手有绝对真理，二把手有相对真理，其他的把手没有真理。过去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我们什么都不用想，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替我们想好了，我们就按他老人家的指示办就行了。毛主席不在了，可这种思想却延续下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本民族最优秀的大脑统统停止了思考。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人生命的真谛在什么地方？生命的终极追求在什么地方？特别有意思的是，没有思想的人批判起有思想的人来，是那么气壮山河。这种情形像什么？像太监说性。有

些人最善于以主流的形式贩卖主流中最差的东西。此话怎讲？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睁着眼睛说假话。今天早上我看新闻，看到马德^[注]卖官的事。马德小时候是个非常穷的孩子。上小学时，一年冬天，他光着脚去学校，看到前面有一摊刚拉出来的牛粪，是热的，他做的第一个动作是把脚插到牛粪里，干什么呢？取暖。没想到牛粪里有个尖石头，当时流血不止，脚差点都没了。但当官以后他变了。他给别人送钱，别人也给他送钱。他给管干部的省委副书记韩桂芝送了八十万。他说：“不送不行啊。不送你就别想在这个位置干。”别人也给他送，同样也是这句话：“不送就别想干。”别人给他送三十万，他把包往外面一扔：“拿回去！”那人回去后又加了二十万，共五十万，再送，他才收。一个国家的

[注] 马德，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因犯贪污罪，受贿和行贿罪被判刑。

官位如果用钱可以买到，或只有用钱才可以买到，那这个国家离完蛋就不远了。但在选举中，韩桂芝、马德这些人却能够高票当选？他们也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呀！这些票是真实的，但真实之中有不真实。选举开始前，韩桂芝等人在台上宣布选举办法：同意的就在选票上什么都不写，不同意或弃权的，在选票上写出来。会议开始，韩桂芝等掌握干部生杀大权的人在台上一坐，摄像机来回转，监票人虎视眈眈，哪里还有人敢动啊。你只要往选票上写一笔，不是弃权就是反对。有的人连外衣都不穿，为什么？就显示他不带笔进来。你看，这就是以主流的形式贩卖主流中最坏的东西。但选举完了以后，往上面一报，都是全票通过。其实哪有这么多全票通过的。

第三，认识我们自己

这里就谈到文化的问题。从制度而精神而文化。改变这一切，最终恐怕还

是要从文化入手。我们常感到北京人素质不高，或者说整个国民素质不高，这可不是小问题，也不是新问题。2008年很快就要到了，奥运会要开了，王岐山市长最担心的是“京骂”。中央芭蕾舞团原团长赵汝衡也讲到北京市民的素质问题。北京人看《天鹅湖》，一拉开大幕就数是二十三只天鹅还是二十四只天鹅，然后所有的人都等着四小天鹅出场。什么德性！要想提高素质，只有从文化入手，从其他任何方面入手都不行。历史就是这么严峻。中国文化既要继承，也要批判。在继承中批判，在批判中继承。我们要有鲁迅对待中国文化的那种大无畏精神。鲁迅早就说过，中华文化是一个吃人的文化。思考鲁迅的同时，我还在思考毛主席。对毛主席，我觉得有些问题也要重新思考。比如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因，过去我一直认为是党内权力斗争，但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

随着我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有了新的感触。为什么毛主席要把这场运动叫“文化大革命”？他是真的想对中国文化进行一场革命吗？鲁迅绝对是对中国文化进行革命的。鲁迅总是选择中国文化最龌龊的地方动刀子。毛主席说他和鲁迅是相通的。毛主席为什么说他和鲁迅相通？毛主席在文化革命最高潮的时候发动批儒、又批孔，意欲何为？你今天看鲁迅的一些东西，他比我们共产党员走的还远，对民族性的批判比共产党还深刻！毛主席是不是真想在文化上做点什么呢？这个我还在思索，有些东西还没思索透。但毛主席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有可比性的。邓小平没有，邓小平把整个中国社会形态转过来了。他是中国第一人，但我们的网上居然有人对小平同志说三道四。还有些愤青竟崇拜希特勒。看看网上这种恶劣的表演，让人非常气愤。然而就是这些人，真正爆

发抗日战争，他们会干什么？那可吃不准。

我们今天对自己的认识，对文化的认识，远远不如鲁迅，甚至不如毛主席。你看最近电视剧《汉武大帝》，收视率这么高，我们的认知在倒退。刘彻被吹捧成什么了？比无产阶级英雄还英雄。什么“燃烧自己，照亮大地”？什么“一个朝廷的名字成了一个民族的名字”？令人恶心。于右任几十年前去茂陵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诗：

绝大经纶绝大才，
功罪岂在悔轮台；
百家罢后无奇才，
永为神州种祸胎。

意即：汉武帝满腹经纶，也有才气，但他曾对国家和民族犯过罪。他犯了什么罪呢？刘彻晚年下了一个罪己诏，认为自己用兵太多，民不聊生。轮台是新

疆的一个地方，从汉武帝时永久划入中国版图。于右任批评他说的不对。那么汉武帝真正的罪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百家罢后无奇才”。中国人的创造力、生命力被儒家文化扼杀了。最后一句话非常深刻：永为神州大地种了祸胎。

由于我们文化的影响，一般人都都不坦白，都不大严格要求自己。人不严格要求自己，就会严格要求别人。人不鞭笞自己，就会鞭笞别人。人不去拷问自己的黑暗，就会去拷问别人的黑暗。王蒙最近讲过一句话：“中国作家不够伟大是因为自杀的太少。”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最后都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日本也如此。川端康成自杀了。三岛由纪夫也自杀了。这个人也有可能获诺贝尔奖。据说大江健三郎也有自杀的倾向。很多人批评王蒙说得不对，我倒觉得他说得有道理。看似调侃，实则深刻。有

资料统计，外国作家自杀的概率为百分之八，而中国是百分之零。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伟大的作家在深刻挖掘人性的负面、解剖心灵的丑恶时，首先要挖掘自己人性的丑恶。唯有如此，才称其伟大。唯有如此，才会痛苦，甚至苦不堪言。唯有如此，才会自杀。这就是个文化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起码我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至少要用党员的标准，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作为一个人，起码是要做一个好人啊！只有做一个好人，才能做一个好官。只有深刻批判我们文化中不好的东西，吸收和继承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才能当一个好人。